

莫雄：党外志士助革命，隐秘壮举救红军

文/羊城晚报记者 文艺 通讯员 任海虹 图/莫栋梁提供

百集文献纪录片《山河岁月》近期在央视一套再热播，展现百年来革命先烈们共同书写的非凡历史，备受党史研究者与公众的关注。其中第18集《隐秘战线的长征》，还原了原国民党粤籍高级将领莫雄与中共党员项与年、卢志英等合力传递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绝密情报、挽救红军的经过。

近日，羊城晚报记者通过采访莫雄后人、党史学者等，深入追寻新中国成立前他所参加的那些惊心动魄而又鲜为人知的“战斗”。

莫雄是广东英德人，是辛亥革命老前辈，国民党资深官员、将领，他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与中共建立了联系。除了上述挽救红军的“隐秘”壮举，莫雄在抗日战争时期还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并释放被捕的中共党员。晚年，他在其幼子莫栋梁的帮助下撰写回忆录，经广东省、广州市和英德县三级政协合编成《莫雄回忆录》一书，1991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16岁加入同盟会的“虎将”

莫雄1891年生于韶关，祖籍广东英德。自幼家中贫困，曾是村里的放牛娃，后因体格出众被相中到广州石室天主教堂做起小伙夫。

随着年岁和见识的增长，莫雄对清政府的腐朽越加憎恶，忧国忧民，并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16岁时，他加入同盟会，承担过打入清朝新军内部执行策反任务，此后一直追随孙中山革命，为中山先生所器重，1923年就被委以独立旅少将旅长的要职。

莫雄虽个子不高，但骁勇善战，是粤军中有名的“虎将”。陈

炯发动兵变后，1925年孙中山开始指挥第一次东征，讨伐盘踞在东江、韩江地区的陈炯明部队，莫雄任粤军第二师第三旅旅长，在这期间屡立战功、威名赫赫。莫雄自述，就是在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期间，部队中加入了不少中共党员，他们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莫雄对蒋介石培植嫡系、排斥异己的政策十分不满。1925年廖仲恺被害一案发生后，蒋介石趁机夺了粤军将领许崇智的兵权，莫雄所在部队也被蒋介石加以“反革命”的罪名，就地缴械遣散。

项与年（又名梁明德，照片右下角的文字是莫雄的手书“革命带路人梁明德同志”）

对共产党有利的事，就尽力去做

共产党的请求党是欢迎的。组织上认为你是在国民党中资历老、社交广，因此，为方便工作起见，以暂不参政为宜……你虽不是中共党员，但党需要你做的事，而又是你力所能及的，就请你帮忙解决，你认为对党有利的事情，你就尽力去做。如果你能做到这两件事，我们便十分满意。”莫雄终生牢记着这份嘱托，并在回忆录里详细记述了这一段经过。

莫雄始终在寻找时机为共产党提供帮助。1934年，他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赣北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赣北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随委任状而来的，还有两份空白的组织表，给了他自行组织用的权限。莫雄意识到这是与共产党合作的绝好机会，便到上海寻找中共方面的朋友，联络刘亚佛、项与年、卢志英等一批共产党员，请他们秘密进入他的司令部潜伏。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50万军队，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直指中央苏区首都瑞金。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受挫，中央根据地仅剩七八个县城。1934年夏秋之交，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庐山军官训练团驻地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对中央苏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莫雄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多次参会。会上，德国军事顾问汉斯·冯·赛克特提出了精心准备的“铁桶合围”战术计划，蒋介石亲自将此作战计划下达到各师师长手里，会议详细罗列了“围剿”计划的兵力布置、包围图表、进攻路线、战斗序列等内容。

莫雄没有任何犹豫，毅然冒着巨大危险，将会议文件装进随身的大公文包里，匆匆带下山去。他马上与刘亚佛、卢志英、项与年三人商议，表示一定要将情报传递给党中央，“天大的事情，由我承担！”危急关头，他们先将庐山上的会议制定了“铁桶围剿”计划一事以紧急电文的方式发向瑞金，其余计划详情则密写在几本《学生字典》中，由熟悉当地方言的项与年亲自送往瑞金。江西属于内陆省份，多山地、河流，在当时落后的交通条件下只能徒步而行。从德安到瑞金，需要经过永修、新建、南昌、丰城、崇仁、乐安、宁都、石城等8个市县，还要面临敌人的重重封锁，越靠近赣南瑞金方向，封锁越严。项与年急中生智，忍着剧痛用石头砸掉了自己的门



牙，弄得满脸血肉模糊，然后乔装成乞丐流浪的模样，最终顺利通过了重重关卡，将情报送达了党中央。这份重要情报使得中央红军在蒋介石“铁桶围剿”的包围态势完成之前，从敌人相对薄弱的地方撤出革命根据地，于10月中下旬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莫雄提供的绝密情报被我党定义为“一份关系到红军命运的情报”，为中央作出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提供了关键信息和依据。经此次合力传递情报，莫雄和项与年之间的友谊更加深厚，并一直维系到晚年。

一枪不发，助红军过境

至城外十多里的山沟，让红军毫发无伤地通过毕节城。蒋介石获知此事，勃然大怒。他命人将莫雄扣押起来，并以“通共”罪将其关押在南京军法处，贵州当地的反动舆论也上下鼓噪。莫雄后来发现了一份民国二十五年的《贵州评论》（第15期），上面赫然写着“严办莫雄”几个大字。在2011年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他将这些新发现的史料和一些莫雄的历史照片，一同增补进了广东人民出版

社再版的《莫雄回忆录》里。

1936年那一次被蒋介石投入监狱中，莫雄被关押了整整150天，后经保释出狱。1937年，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形成全民族抗日的崭新局面。为平息南雄匪患风波，莫雄又获国民政府任用赴广东北江地区，任南雄县县长。在此任上，莫雄应中共党组织要求，设法释放了国民党余汉谋“剿共”部队在湘、粤、赣边区抓捕并羁押在南雄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两三百人。

从“莫大哥”到“党的老朋友、老同志”

莫雄在粤北一带素有名望，人们尊称他为“莫大哥”。1938年10月22日凌晨，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为维持粤北抗日后方的稳定局面，莫雄出任第四战区北江挺进纵队（简称“北挺”）司令。莫雄任职后，他迅速与中共北江特委达成了合作抗日的约定。

1940年初，北江特委组织了40多位党员和进步青年，通过各种渠道来到“北挺”（几年来，先后派到莫雄部队和在那里发展的党员达100多人），并建立起党的特别支部……莫雄当时的战友朱小仲，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东省科协副主席，他在回忆文章《有这样一位难能可贵的老朋友——回忆莫雄将军在抗战期间与我党团结合作的事迹》中提及了这一段经历。包括朱小仲在内，饶华、邝达、黄桐华、何俊才、林名

勋等多位中共党员，当时都曾潜伏在莫雄部队。

后“北挺”改为“北江挺进队干部训练所”（简称“干训所”）。

从行事作风观察中，莫雄察觉到黄桐华等人很有可能是共产党员，仍放心地将训练所的组织大权交给了他们，由其物色对象、组织训练。后来部队改编，莫雄任司令，黄桐华还担任过他的副司令。在莫雄工作的这些中共党员，在思想上帮助官兵认清形势，坚定抗日信心；在工作中帮助莫雄整顿部队，提高威信，扩大社会影响。党组织又通过莫雄的关系，营救被捕的党员，筹措活动经费等，为建立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创造了条件。

在日军投降后，莫雄司令部的大部分人员都跟随黄桐华、何俊才等上了山，竖起共产党的旗帜。

莫雄回粤后，被中共中央华

南分局任命为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协助中共肃清北江地区的反动武装及匪患，为稳定粤北的社会治安和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创造了条件。

此后，莫雄还历任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第五届广东省政协委员等职。在参政议政的生涯中，莫雄多次被中共领导人亲切地称为“党的老朋友、老同志”。他在自述中动情地说：“没有什么比‘党的老朋友、老同志’这一称呼更令我感到光荣与骄傲了。”

他们都曾以实际行动襄助革命

羊城晚报：今天我们该如何评价莫雄，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曾庆榴：莫雄对革命做了很多有益工作，是广东一位著名的地方实力派人士，长期站在反蒋战线上。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暗杀后，汪精卫、蒋介石掌握广东政权。莫雄当时是粤军将领，蒋以查办“廖案”、整肃“不轨”军队为名，大肆排斥和打击异己。粤军不少将领都遭排斥打击，莫雄的军队被缴械、被收编，这是他走上反蒋之路的开始。可以说，国民革命阵营里的反蒋派，是蒋介石自己制造出来的，是他搞独裁专制、排斥异己的結果。

当然这也是莫雄一步追求进步、与共产党合作的基础。红军时期，莫雄冒很大风险给红军送情报，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站在同情、支持革命一边。全面抗战爆发后，经过共产党员古大存做工作，莫雄还释放了一批关在南雄监狱中的“政治犯”，以实际行动襄助革命事业。

广东省委开展抗日统战工作时，莫雄是很重要的一个对象。此外，第十九路军抗日将领张炎、曾担任第七战区第四挺进纵队司令官的伍观淇、成立第四路军看护干部训练班的陈汝棠等党

外人士，都跟共产党有过合作。

羊城晚报：由您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第一卷）》，专门介绍了抗战时期我党对莫雄等党外人士进行的统战工作。

曾庆榴：著名的党史学者胡绳认为，当时在国民党、共产党之间，存在大量的“中间势力”，中国革命之所以胜利，关键原因是共产党把“中间势力”争取过来了。这令我们很受启发，感到党史研究不应发起，感到党史研究不应孤立地进行，而应重视和加强对“中间势力”如何转变的研究。因此，我们注意收集像莫雄、伍观淇、张炎、陈汝棠这样当时的进步人士的信息，还有更早时期的邓演达、李济深以及稍后的司徒美堂等人的情况，努力将他们与党的联系、受党召唤的过程梳理清楚，为他们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作出恰当的评述。

羊城晚报：对以莫雄为代表的曾有助于我党的党外人士的研究梳理对党史研究、党史教育有什么意义？

曾庆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活动不是孤立的，共产党是生存、活动在人民群众中间，要了解党的历程，必须把周边的情况弄清楚。现在还有许多研究的空间，比如谭平山，这是一个经历非常丰富的人，但我们现在对他的了解还是不太全面。

陈汝棠 医疗抗日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陈汝棠，广东高明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作为国民党部的著名军医和抗日进步人士，陈汝棠接受中共党组织的提议，在广州组织建立了第四路军看护干部训练班（以下简称“护干班”）。护干班学员有350余人，其宗旨是培养战地救护和初级医疗人员。出身中医世家的陈汝棠，亲自给护干班学员上课，参加班中讨论，启发同学们探求真理、提高思想觉悟、认识改造旧中国政治的责任。

1938年10月广州失陷后，护干班改编为广东省赈济委员会救济总队（简称“救济总队”），陈汝棠先后任班主任、总队长。中共

在各个分队里建立了党的秘密支部、党小组或派驻党负骨干，共产党员有近80人。

在陈汝棠的带动下，护干班学员走出校门，积极参加抗日工作。

这支队伍经过党的政治教育和陈汝棠的悉心培养以及在战斗中的锻炼，在抗日斗争中同仇敌忾，斗志昂扬。日军入侵广州时，牺牲于增城朱村的护干班学员有50多人，他们是抗击日军、保卫广州的第一批牺牲者。

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陈汝棠为中共做了大量工作，被称为“党外布尔什维克”。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逆流中，这支队伍始终坚持斗争，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黄沙水产新市场主体结构封顶

新市场投产后，只需一键下单，生猛海鲜直达餐桌

计划在2023年下半年完工

建于1994年的广州黄沙水产市场是原国家农业部指定的全国三大活鲜水产批发市场之一，是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农业农村部定点市场，国家水产品价格采集定点单位，有“全国水产品价格风向标”的美誉，也是“广州”的城市名片。该市场汇集全球20多个国家中高端鲜活水产品，涵盖海鱼、虾、蟹、贝类等200多个品种，鲜活水产年交易量逾27万吨，年交易额逾100亿元，现有注册企业110家。经过近30年发展，黄沙水产市场成为中国最大的鲜活海鲜批发市场，“黄沙水产”品牌享誉全球。

9月29日，广州黄沙水产新市场主体结构封顶活动在荔湾区沙洛片区举行。记者采访获悉，新市场建成后，将成为大湾区首个智能化鲜活海鲜交易市场和世界级高端水产市场旅游体验中心。此外，新市场还将建立起“线上商城”，老广只需一键下单，来自黄沙水产市场的生猛海鲜就将直达餐桌。

但是，由于旧市场建设年代较远，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在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后，产生了水污染、垃圾乱堆等问题，其次，由于旧市场装卸面不足，也容易导致交通拥堵。

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州黄沙水产新市场项目从2020年5月29日开工建设，该项目是广州市“菜篮子”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广州市“攻城拔寨”重点项目。据介绍，新市场项目位于广州市荔湾区环城高速西南段，珠江主、副航道交汇处的白鹅潭商务区南门户，项目总建筑面积近19万平方米，总投资约27亿元，设水产铺位超500个，室内停车位超1100个。项目建有包括鲜活水产交易区、水产物流配送区、电子商务及办公区、冰鲜冷库区及停车场五大功能区域。从高空

俯瞰，黄沙水产新市场宛如整装待发的一艘“巨轮”，蓄势启航。

“新市场项目由广州港集团独立投资建设，于2020年11月动工。经过前期精心策划和有序施工，主体结构已顺利封顶。项目地上7层、地下2层，下一步将开始进行装饰装修、设备安装等，计划在2023年下半年完工，建成后将组织现黄沙水产市场商户有序搬迁至新市场经营发展。”黄沙水产新市场项目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彭学忠介绍。

将串联起水产品“产地到餐桌”全过程

黄沙水产市场管理中心主任谭慧映介绍，新市场将在传统水产品批发市场集散功能的基础上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通过专

业化的智能化管理系统与科学化的运营组织，有效串联起水产品从“产地到餐桌”的全过程产业链各环节，打造集水产交易、展贸、检测、拍卖、金融、电商、海洋水产科普于一体的智慧型水产综合体、世界级的高端水产市场旅游体验中心，助力构建水产大消费、大流通格局，以高品质的供给引领加快消费市场提质升级，提升大湾区城市消费能级。

据介绍，该项目充分考虑水产市场本身发展配套需求，整合周边用地功能，构建完善的配套设施体系，并在新市场沿江一侧将建造观景步道，市民可以体验楼下采购海鲜、楼上加工海鲜、饭后沿江散步的“慢”生活，营造具有国际视野的智慧型水产全产业链运营商和行业创新引领者，为大湾区产业升级、广州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市民“菜篮子”保价稳供作出积极贡献。

广州·城事

A10

文/羊城晚报记者 沈钊

图/羊城晚报记者 曾育文

